

青 诉

他们为什么这样需要支教老师

■ 张晓晖 (河南大学德语系主任, 公益项目 母亲助学 活动发起人)

请重视通勤难题 背后的青年呼声

■ 黄 帅

通勤难几乎是世界各大城市居民共同面对的问题,而在发展中国的大都市里,这个问题格外明显。如果你早晨8点在北京的天通苑地区乘坐地铁5号线(开往宋家庄方向)会毫不意外地成为 进城大军 中的一员,极其拥挤的车厢与漫长的候车队伍会让你一早晨的清爽感顿时消失。而这的一幕不过是发生在北京早高峰进城方向的地铁里的常态,每天都会上演,甚至双休日也不例外。到了傍晚,拥挤的人群向潮水一样涌入出城方向的地铁。

《中国青年报》曾报道过年轻人在通勤难题下 幸福感 缺失的问题,并援引剑桥大学等机构在2017年对3.4万余名上班族展开调查的结果,通勤在1小时以上的上班族,抑郁几率高出平均水平33%,产生与工作相关压力的风险高12%,每晚睡眠时间不足7小时的可能性高46%。事实上,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上下班的通勤时间若在1小时以内,还算比较快的,如果能乘坐地铁直达,幸福感 或许还高一点,如果是乘坐拥挤的公交车,或地铁+公交 模式,则会让人更加烦躁。

过去,通勤难题往往被视为交通拥堵问题的 次生问题,交通部门也一直在努力化解拥堵难题,但往往是旧问题刚解决,新问题又来了。单从交通拥堵层面理解通勤难题是片面的,其背后有更大的问题。

首先,是就业地与居住地长期分离的问题,客观来说,这是城市化的一个必然过程,发达国家曾经遇到过的难题正在中国陆续出现,这是因为我们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城市化有两个维度的问题,一个是农村向城市转化,这点可谓众所周知。但还有一点则多被人忽略,就是小城市的人口、资源与资本逐渐向大城市转化,而新世纪以来形成的一线城市,就是这个维度上的城市化的典型代表。年轻人求学、就业也呈现出 大城市化 的现象,这就导致更多人涌入大城市。

但是,这些城市却没做好 精准对接 的准备。在计划经济时代与市场经济时代初期,市民就业地与居住地大多在一起,大家被绑定在一个稳定的单位里,各种 大院 分布在城市的不同位置,除了外出游玩、访友,没有太大的通勤需求。而当单位分配住房的时代结束后,年轻人在大城市工作就必须租房、买房,工作地点大多在繁华的市区,若住在郊区,就势必要成为 潮汐人群。以北京为例,主城区周围有好几个 睡城,这其中既有天通苑、回龙观、通州、亦庄等区域,也包括河北燕郊、固安乃至廊坊等周边城镇。上海也有不少人纷纷在江苏昆山买房,为了房价比上海市区便宜不少,却每天忍受通勤难的困扰。

要解决这个难题,还得从城市规划的层面上讲。比如在 睡城 和卫星城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尤其是高端产业不能只集中在主城区。简单来说,就是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上班。一个成功的例子是望京地区。望京在早期也曾是北京城外的 睡城,但如今已是各大商业机构密集的资本聚集地,望京可谓同时具备居住职能与就业职能,但更多 睡城 还没有实现这个职能的合并。

其次,是交通方式革新的问题。虽然北京近年地铁发展迅速,但不少线路长期处于过饱和状态,尤其是连接 睡城 的线路,每到早晚高峰都人满为患。另一方面,北京的公交线路也在不断优化,公交出行、绿色出行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但堵车尤其是环路堵车的难题,一直得不到很好的解决。

在不少人的观念里,城市道路的确越修越多,越修越宽,但似乎堵车也越来越严重了。这当然不能简单归咎于道路因素本身。德国数学家布雷斯曾提出一个著名的 布雷斯悖论,大致意思是说在一个封闭的区域内增加一条路段,反而使此路的拥堵情况加剧,因根据博弈论的原理,人们通常会选择 走捷径,造成新拓宽的道路迎来了更大的流量和车流量。这个悖论已经成为城市规划学里的经典判断,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依然不能很好地选择通勤路径,多数人选择了共同的路径,就难免要遇到拥堵难题。

除了时间问题,再就是通勤交通工具的舒适度问题。如果是乘坐交通工具,就不可能像乘坐私家车或网约车那样舒适,对此,倒也没什么好抱怨的。但即使是公共交通的设置,也可以在细节上给人更多的温暖。比如,有不少北漂的年轻人在燕郊居住,除了乘坐跨市的公交车,一些人选择从燕郊坐火车进京。但因为燕郊之于北京市区也算得上是一个 睡城,每天通勤人流量大,时间集中,有时劳累一整天后还要在拥挤的大巴车上站一小时,实在令人头疼,或许能从细节设置上对年轻乘客们多一点关怀,比如增加发车频次、改良乘坐体验等。

说到底,大城市的通勤难题也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需要统筹考虑问题,同时对具体问题对症下药。毕竟,给年轻人的生活体验里增加一点幸福感,也就是给未来增添一点希望。

2018年暑期支教开始之前,河南南召山区的家长和学生们就催着老师们来问:支教老师还来不来?

当时,我们组织的春季支教才刚刚结束不到一周。每次有人来问,我都明确给了肯定答复,但他们还是不停询问。着急的人索性要我的电话和微信,不断地发来信息。

我知道,他们之所以追问,是害怕再出现两年前暑期支教中断的情形。

玩到寂寞 的山里娃

2007年,我们第一次来到地处伏牛山腹地的南召县,是为了发放助学金。第一站是不通车、离最近的路口20多里地的大沟村小学。

学校很小,只有两间教室,1名专任教师,1名代课教师,却有4个年级。

门前有一条山溪,清澈见底,是山上和山下居民共同的水源。背后则是连绵的群山,是孩子们采山打栗子的场所,也是他们课后攀爬嬉戏的乐园。

当年,学校对面还有很多草房,村里的房屋也大多破旧。如今,村里大变样,那些过去看起来在风雨里随时会倾倒的旧屋逐渐变成了亮堂的瓦房甚至楼房,室内装修也颇为讲究。

然而,校舍并没有太大改变,外出打工的家长依旧外出,留守在家的孩子,还是一见到我就会提起他们每到暑假就玩到寂寞 的苦恼。寒假有回家过年的亲人陪伴,上学期间有小伙伴一起玩要,然而暑假,通常只有隔辈的爷爷奶奶一同生活,他们对新事物并不明了,且要负责耕作与家务,除了照顾生活起居,并不能给予更多。

山里的人,彼此在不同的山头居住,有时十余户构成一个村组,有时几户甚至一户便成一自然村。因此,山里的孩子,身边可以一起玩耍的同龄人并不多,而要找同学一起玩,山路少则三五里,多则十余里,长辈出于安全考虑,多数时候不会允许他们单独前往。

用孩子们的话来讲,这样的暑期生活,前几天因为不用上学开心,但玩不过一个星期就玩到了 寂寞,除了玩,还是玩,也没有人陪,关键根本没什么可玩。

他们最常提到的是英语

关于课程,孩子们最常提到的是英语和兴趣课。大沟村这样的非完全村小,地处偏远,老师年龄较长,没有条件,也没有师资开设英语、绘画、音乐、体育等课程。只有语文数学两门课,还要两个年级共用一个教室,学习效果的提升与学习兴趣的培养都成了难题。

学生念到五年级,转到镇上读书,突然发现,自己和三四年级甚至更早开始学习英语的其他同学之间的差距大到超出想象,进而失落,沮丧,拼命追赶中,热情逐年降低,很大一部分人义务教育没有完成便已辍学。

每次结束助学离开时,这群山里娃都会拉住我的手,央求我可否多停留两天,周六周日教他们英语,他们不想回到镇上学习后,落后别人太多。

孩子们的眼神里,充满了期待,充满了渴望,也充满了让人怜惜的不安,他们害怕我会拒绝,所以表面安慰我实则自我安慰地说,老师你不留下没关系,我们只是问问,就像害怕爸爸妈妈会外出打工一样,希望他们留下,但他们最终还是走了。

那一刻,心脏好像被脆弱击中,突然



河南南召大沟村小学,学生们跟支教志愿者们在一起。



孩子们写给支教志愿者的信。

不知所措。明明还要坐10多个小时车赶回学校给自己的学生上课,此刻必须离开,却一班子不知如何开口告别。

我坐上校长夫人的摩托,看着孩子们一直在后面奔跑,追了很远送我。

复又下车,坚定地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愿意,这个暑假,我会来,并会带着大里的哥哥姐姐来教他们英语。

孩子们立刻欢呼着围过来,纷纷举手表示赞同。有人举起双手,有人索性坐在地上,开心地把双脚也举起来。

那一年,是2010年,我来这里助学的第四年,我第一次感受到这群孩子对学习的渴望如此之深,除了他们的寂寞,更多的是因为走出大山的梦想与现实教育资源匮乏构成的落差。

那年暑假,在山区老师和当地村民的支持和帮助下,我们正式在南召山区合作助学的3所村办小学开始了短期支教。每

年暑假和春季实习期间各办一期,每期3周。

我们很害怕,今年又没老师来

除了支教,我们继续资助山里的贫困生,为他们创建图书室、活动室,带他们来城市和大学参观体验,并借助城里的力量实现他们的礼物梦想。我们和山区的老师彼此分工,他们继续负责学生主干课,我们则主要负责打开学生视野,为他们创造看向大山之外的窗口。

支教的生活十分辛苦,学校没有宿舍,桌子也高低不平,睡在地上反而更舒服。这些生活的困苦就像北方寒冷的 物理攻击,完全在可承受范围,反倒每次支教前后都会收到身边人默默转发来的大量的关于短期支教的批判和他们间接的否定,让我每每感到一种无力的孤独,甚至



两间教室却有四个年级的复式教学班。



舍不得支教志愿者离别的小学生。

对自己所作的努力是否存有价值产生质疑。

这种犹疑与我之前看到的学生眼神里对知识的渴望构成了矛盾,而矛盾,让我变得不再坚定。每次支教前,我都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和山区老师与学生确认,他们是否真的希望我们来。

尽管每次都得到肯定的回答,我还是会因为每一年重又收到的那些否定支教的文字神经质地再次去问。这种反复和疑虑,直到去年,我们意外中断一年支教后,才彻底被打消。

亲爱的老师:你们好!欢迎你们的到来,在你们没有来之前,我们多么希望你们赶快来,因为上一年的暑假没有一个老师来,我们很害怕,今年又没老师来。

百团大战 刚过 退社潮 来了

■ 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 王培莲 实习生 胡明睿

台,下面坐着的就各自聊天,还有不少(人)进社团就是为了处对象。

看不下去,但也不愿多言,李晨不指望自己或是几个人的建议能让社团有多大改观,凑热闹的人太多了。现在,他准备自己做一个音乐类社团,把认真玩音乐的人聚在一起。

同样读大二的师范生赵莹,现在可以一门心思学习了。从大一上学期开始,她陆续退出了3个社团。她加入过的是校级社团,两个校园媒体类和一个演讲与口才类。在她看来,校级社团的活动质量也不尽如人意。

她发现,有些社团在刚纳新后活动比较多,到第二个学期就少了。有些活动前期宣传范围很广,但完成质量并不高。一些大型活动,因分工不明确,社员之间很容易出现摩擦,直接影响活动效果,活动不好,不愿再去浪费时间。

虽然已经退出社团,但当有学弟学妹咨询时,她还是会建议他们积极加入社团,多去尝试和经历。

人各有志 好好聚散

大三的王誌是东北师范大学一个校级

社团的负责人。每次有干事提出退社,他都会尊重对方的选择。如果发现能力很强,也会尽力挽留,告诉对方留下来的发展和收获。每个人加入社团后或多或少都会有落差,比如(觉得)活动吸引力不够,或是参与的工作太琐碎。他认为,若能放下抵触情绪,尝试融入,善始善终,还是能学到很多东西的。

人各有志,好好聚散,每个人都是在尝试找到自己的方向。在湖南读书的大二学生王婷最终放弃了院学生会的宣传部,选择留在校友工作志愿者协会。

进入社团的新生都是从简单的初级工作干起,还得看留下来是否有收获和归属感。王婷不愿意留在学生会宣传部一直做海报,她想在校友工作志愿者协会结识更多领域的朋友。

校友工作志愿者协会负责接待返校的校友,还有机会在暑期去全国各地采访优秀校友。有机会与校友交流,对专业和未来发展也可以早一步清楚,这是王婷比较看重的,现在她已经成为该社团的负责人。

大一时,中文专业的刘佳敏一口气加入了6个社团:3家校园媒体、1个国际学

生交流协会、1个绘画类社团,还有学院的学生会。在她看来,这不是盲目,而是便于做减法,不亲自了解和尝试,怎么知道哪个社团更适合自己的。

最终,经过一番退社,刘佳敏选择留在学校的大学生记者团,这与她的专业相关,而且能得到在学院和班级里没有的平台和机会。除此之外,她喜欢记者团的氛围,大家私下里常聚餐和聊天,关系十分融洽。

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刘佳敏觉得自己退出社团有些草率,认为做基础性工作是在浪费时间,她想想法摆脱自私和幼稚的。

这是正常现象

很多高校的兴趣类社团是两年制,学生升大三时会换届,大二学生是中坚力量。东北师范大学大二学生赵星妮是4个社团的中坚力量。到了学期中后期,学业压力变大,她看到周围不少学弟学妹想要退出社团。

从基础工作干起,对退出还是留守,赵星妮很有感触。社团需要新鲜血液注入,纳新时肯定会重点宣传自身优点。她认为,在社团里不能一味要收获和归属

幸好你们来了,你们可以陪我们度过愉快的暑假。非常感谢你们!

我们很喜欢你们每一个人!你们也要喜欢我们,不可以讨厌我们啊!

2016年,河南大学暑期试行三学期,学校安排有课,我们没有来山区支教,就在这一年,孩子们几乎隔两天便会问我,什么时候来?知道我们暑假不来了,又担心地问是不是再也不来了?是不是他们对我们不够好,所以我们生气了才不来?

告诉他们都不是,但是他们还是不放心的。

一年后,2017年暑假,志愿者如约而至,刚下车,就看到孩子们齐刷刷地站在校园里等着迎接我们,而黑板上写的正是上面的这句话。

他们那一句 我们很害怕,今年又没老师来 戳中了我们所有的脆弱与不坚定的摇摆,那一刻,关于支教是否需要的疑虑忽然变得不再重要。

家长们甚至愿意付费

暑期支教中,很多困难需要面对,首先是志愿者和当地学生的安全。在中王庙村小学支教的第二年,我们就遇到了当地多年未遇的水患。两名白河下游其他村的孩子落水遇险,安全突然成了悬在每个人心头的最大忧患。

我们决定提前一周结束当年的支教,然而就在准备公告的前一天晚上,得知我们要离开的消息,家长们纷纷带着孩子跑来学校挽留,不知原委的他们害怕哪里惹慢了孩子,焦急地询问怎么做可以让我们留下,甚至拿出众人临时凑出的钱,表示愿意付给我们学费,一定要让孩子们多学一些知识。

得知事情的经过,家长们承诺每天都会接送孩子确保路上安全,学校老师则集体牺牲假期来帮忙维持秩序,村里的代课教师、退休的老教师、年迈的老村干、学校附近的阿姨,尽管家里农活千要做,尽管其中一部分人生活困难,但每个人都前来协助,用他们的话,只要能给孩子们带来好处,带来希望,哪怕一点点,他们都觉得所做值得。

随着支教的持续与深入,村民们越来越多参与其中,知道我们买菜不方便,他们商量好似的,一家一天轮流来学校送菜,而且他们十分清楚支教团 不准拿群众一针一线 的规定,每次送菜都趁着我们上课,悄悄挂在校门上,一声不吭便走了,让我们无从拒绝。

不光志愿者,山区的老师、家长、村民们共同守护着支教的梦想,渴望着山里娃更好的未来,所有人努力投身其中的原因,也许从中王庙村小学陈贞会老师的这两段话中可以找到答案:

暑假一来,城里各种各样的辅导班、特长班、预科班、夏令营办得热火朝天。而农村的孩子,暑假简直是进入了一场 夏眠。一切都不再正常运转了。离开学校,没有老师的管教,也没有父母的陪伴,疯狂玩上几天,便连玩也觉得没意思了。

支教恰好能解决这些问题。志愿者们英语和兴趣课程,包括支教结束前的文艺汇演,让每个孩子都有参加快乐学习的机会,每个人都能尽情展示自己的风采。老师和家长都被他们的表现折服,原来我们山区的孩子也可以这么优秀。支教结束后,志愿者们和孩子们保持的长期联系也让这一活动无限延伸。支教虽然短暂,但给孩子们带来了无限的光和美,愿孩子们能循着大学生志愿者的足迹,一路前行,寻找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

感,还需要一定的付出。而对于刚进入大学还在迷茫期的新生,社团也要给他们试错的机会。

一段时期内,大学生集中退出社团是一种正常现象。东北师范大学团委副书记李鹏认为,这是学生自我认知的不断完善,也是社团自身发展的 健康 途径。

好活动的标准有很多,也因人而异。在李鹏看来,活动的质量取决于社团自身的特点和负责人的水平。相比于学生会组织的大型活动,无论活动范围还是影响效果,都是兴趣类社团无法比拟的。兴趣类社团更多是针对内部成员开展小而精的活动。归属感和获得感还要看学生个人在社团活动中的参与度。

大学时期的刘雨婷,当过两年校级社团的负责人。她建议,想提高能力可以加入学生会,要发展个人爱好就选择兴趣类社团,最好同时兼顾校级和院级两个层次。她举例说,在学院选了团委和学生会等组织,可以同时选择一个校级的兴趣类社团,接触更多思维模式的同学。可以加入两三个社团,最后保留一两个,坚持做下去。

想起填写社团报名表时的情形,昆明理工大学大一学生赵一鸣觉得 有些好笑。因为招架不住学长的热情,他加入了学校的青年新媒体中心。和大家一起探讨创意摄影,还一起游玩、聚餐,让他的大学生活精彩了不少。选择社团前,还是要多了解,但也不用太紧张,每个社团都有自身的魅力。他说。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学生除王誌和赵星妮外均为化名)